

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 「鬥鬼」風潮（下）

• 樊建政、董國強

編者按：本文第一至三節已於2022年6月號刊出；本期刊出第四至七節。

四 裂痕的出現

1966年6月，就在復旦大學大張旗鼓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之際，南京大學爆發了「倒匡」事件（又稱「六二事件」）。6月2日，該校部分師生貼出大字報聲援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的「革命行動」，並對南大存在的一些問題提出質疑和批評，結果遭到南大黨委書記兼校長匡亞明的猛烈反擊；在中央文革小組的強力干預下，江蘇省委於6日決定撤銷匡亞明一切職務；12日，江蘇省委在南大操場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批鬥匡亞明；13日，江蘇人民廣播電台廣播了南大「倒匡」消息^①。

6月16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並配發新華社記者在15日採編的長篇新聞報導。該社論將南大「倒匡」事件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認定匡亞明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份子」，宣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他們盜竊黨的名義，把自己所控制的許多部門，當作進行反黨活動的障地」，「運動剛剛開始，群眾還沒有發動起來，他們就颯陰風，造謠言，製造混亂，轉移目標，設下重重障礙，束縛群眾手腳」，「這些傢伙們有個奇怪的邏輯，誰要揭露他們，誰要反對他們這夥黑幫，就說誰是『反黨』、『反中央』」，重申「要取得這場鬥爭的勝利，必須放手發動群眾」，支持還是反對群眾運動「是區別革命與反革命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標誌」^②。新華社的新聞報導則借南大「革命師生」之口，指責匡亞明「有意混淆了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性質，要學生『投入學術大批判運動』，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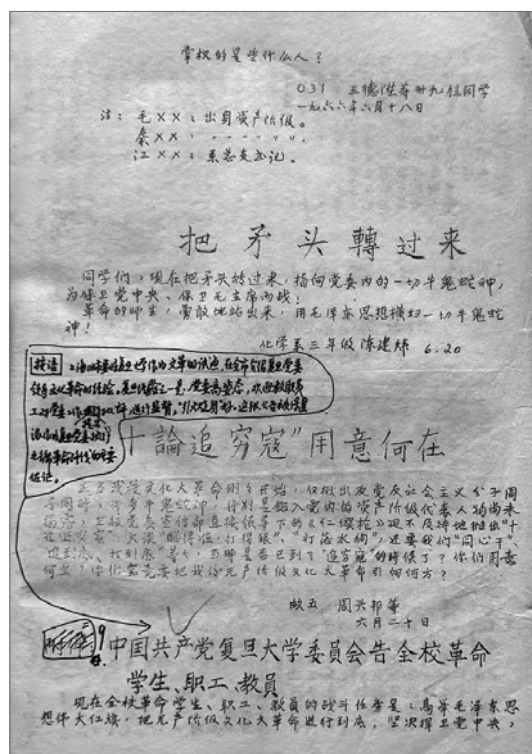
本不提這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還指責他「挾持黨組織，欺騙黨員，先把自己說成是『絕對正確』，然後別有用心地誣蔑批評他的人是『不懷好意』，布置立即組織『反擊』，煽動大家『不能手軟』，對革命師生進行惡毒的誣蔑、謾罵和恐嚇」，「給那些革命積極份子戴上各種無中生有的『帽子』，強迫他們『檢討』，還下命令要一律取消那些寫大字報的預備黨員的資格」，並說「這些暴行，完全暴露了匡亞明這個資產階級保皇派對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刻骨仇恨」^③。

「倒匡」事件的持續發酵使復旦校園內的大批判運動發生了明顯分化。一方面，6月17日起，復旦「革命師生」群起批判已調離復旦的前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陳傳綱。陳傳綱（1912-1966），1929至1935年就讀復旦新聞系，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奔赴延安，1949年後相繼在中國政法大學和中國人民大學工作，1958年調任復旦黨委副書記、副校長，1966年初調任上海市高教局局長兼黨組書記。陳傳綱是個極富知識份子氣質的中共領導幹部，與匡亞明秉性相投、私交不錯^④。他和哲學系師生熟悉，是因為1965年曾與他們一道去上海郊區農村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次哲學系部分學生要求批判他，是因為他在6月4日到該系座談文革運動，就批評「三家村」、北京市委改組、聶元梓大字報事件和上海各高校文革運動情況發表了一些看法。他還聊到不久前赴南大溧陽分校參觀座談，對匡亞明的教育改革舉措十分讚賞。14日，部分哲學系學生將上述情況寫成揭發批判材料〈向陳傳綱同志提出十二個為甚麼〉初稿，提交復旦黨委審閱^⑤。

其實陳傳綱的狷介做派和「自由化」傾向，早就引發了校內一批工農出生的老幹部（包括復旦黨委代理書記王零）不滿；而且他在延安整風時期受到王實味事件牽連，被打成「五人反黨集團」成員之一，也被這些人視為歷史污點（如果不是得到上級黨委的寬容和保護，他可能早就遭到撤職查辦）。既然新的時勢需要揪出一個像匡亞明那樣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便積極支持「革命師生」批判陳傳綱^⑥。

6月16日，上海市委教育衛生工作部（教衛部）部長常溪萍親蒞復旦布置揭批工作^⑦。17日，復旦黨委常委擴大會議正式決定揭批陳傳綱。當晚，一位校黨委副書記到哲學系召集「革命師生」會議，說「黨委支持你們的革命行動」。「革命師生」深受鼓舞，連夜修改大字報〈向陳傳綱同志提出十二個為甚麼〉^⑧，羅列了陳傳綱關於四清運動、「學毛著」活動和文革運動的一系列「反動」言論，質問他與匡亞明到底是甚麼關係？為甚麼要「一分為二」地看待前北京市委負責人？貶低聶元梓大字報居心何在？等等^⑨。18日，在復旦黨委的統一部署下，以復旦電光源實驗室主任、著名「工人專家」、「學毛著標兵」蔡祖泉為首，復旦各級黨團幹部踴躍貼大字報揭發陳傳綱，宣稱要把「陳傳綱的反動面目徹底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⑩。此後，校黨委又召開了兩次常委擴大會議，發動所有幹部貼大字報揭批陳傳綱。19日晚，校黨委召開總支書記會議，王零反覆重申校黨委與陳傳綱之間存在原則性分歧。21日，校黨委通知陳傳綱回校看大字報。當晚，陳傳綱在校園裏被四百多名師生圍鬥半個多小

時，多名校黨委領導親臨現場助陣。「陳傳綱老實交代！」「陳傳綱低頭認罪」等口號聲此起彼伏。陳傳綱對此毫無心理準備，表現極其狼狽，鞋子都被踩掉了。當年10月，陳傳綱不堪侮辱，服安眠藥自殺^⑩。



1966年6月20日，化學系學生陳建煒貼出〈把矛頭轉過來〉大字報，被稱為「復旦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圖片由樊建政提供)

其中，化學系部分學生的大字報〈把矛頭轉過來〉明確提出：「把矛頭轉過來，指向黨委內的一切牛鬼蛇神」^⑪；經濟系部分學生的大字報〈校黨委要把我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何處？〉指責校黨委與黨中央、毛主席唱對台戲，說「兩報一刊」（《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社論要求「橫掃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橫掃一切牛鬼蛇神」^⑫，而校黨委自以為絕對可靠，只強調對「反動學術權威」的批判，「企圖轉移鬥爭目標」^⑬；中文系部分學生的大字報〈向黨委開火〉，更是火力全開，認為「『黨指向哪裏就打向哪裏』是修正主義的口號」^⑭。不過，當時大多數學生對於上述大字報持反對態度，他們也貼出大字報，宣稱「誓死保衛校黨委」，強調「以王零同志為首的校黨委是絕對正確的」，「對校黨委的一切懷疑都是反動的反革命的」；化學系學生大字報上的署名被畫上了圈圈或叉叉^⑮。此即復旦文革史上的「六二〇事件」。

以上所述之分化均起源於復旦黨委和師生對文革運動的響應，其本質都是試圖框設株連對象，唯一差別是雙方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即復旦黨委及其擁護者只關注陳傳綱與匡亞明意氣相投，只關注「反動學術權威」，而少數師生還關注「倒匡」社論所述匡亞明之罪行種種，復旦黨委樣樣不缺。自此，以對校黨委的態度為分野，復旦師生分裂成「多數派」和「少數派」（又被校黨委稱作「活躍份子」）。

另一方面，部分師生開始質疑復旦黨委的文革運動方法、步驟及批判重點。6月19日晚，數學系部分學生率先貼出大字報質問校黨委，運動才剛開始，僅僅揪出了周子同，在其他「牛鬼蛇神」，特別是鑽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尚未揭露的情況下，拋出「十論追窮寇」用意何在^⑯？20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繼續以極為亢奮的語調批判「保皇派」和「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害怕群眾」、「千方百計地壓制群眾的大字報」，並號召「放手發動群眾，放手讓群眾寫大字報」^⑰。當天，復旦各系普遍出現了針對校黨委和系總支的大字報或言論^⑱。

五 復旦黨委陷入困境

對於「六二〇事件」，復旦黨委雖震動不小，卻不驚慌失措，他們自信可以繼續掌控復旦文革運動的走向，因為該事件中擁護校黨委的大字報佔壓倒性多數。他們一方面召集中層幹部會議，強化黨的組織紀律觀念，防範黨員幹部中有人「起義」；另一方面又主動提出「引火燒身」的口號，避免有「壓制群眾」之嫌。在前述6月19日晚復旦黨委召開的全校總支書記會議上，王零告訴與會者，「現在是考驗幹部的時候，也是牛鬼蛇神出籠的時候。共產黨員要撻起腰，各個總支一定要頂住，主動地領導鬧革命，組織好隊伍，不能自亂陣腳。要引火燒身，歡迎革命師生繼續揭發黨委的問題，使牛鬼蛇神暴露出來」²⁰。21日，復旦黨委發布〈告全校革命學生、職工、教員〉，「歡迎全校革命學生、職工、教員對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對我們的工作加以監督」²¹。

復旦黨委只承認有缺點、錯誤，這意味着依然自認為絕對可靠（類似說法還有「絕對正確」、「完全正確」等²²，其實質是說校黨委的權威不容挑戰），其所謂「引火燒身」旨在「使牛鬼蛇神暴露出來」。6月23日晚出版的學生牆報《紅纓槍》第六期換湯不換藥，依舊堅持「追窮寇」²³。然而「少數派」學生不明就裏，繼續就校黨委的「錯誤」言行提出質疑和批評，很快便聚焦到校黨委利用《紅纓槍》操控校內文革運動的問題上。在「少數派」學生看來，《紅纓槍》名為學生刊物，實為校黨委喉舌，不少知情者如《紅纓槍》抄寫員、校辦工作人員等加入揭批校黨委的活動，證實了「少數派」學生的猜測²⁴。於是，復旦校園內的揭發批判開始轉向復旦黨委宣傳部部長徐震身上。徐震（1929-1993），中共地下黨出身，1952年復旦新聞系畢業，並留校工作，1966年1月當選中共復旦黨委常委、黨委宣傳部部長，4月擔任復旦「文化革命」辦公室副主任。6月25日的〈黨委宣傳部長徐震是甚麼人？〉、〈把《紅纓槍》從資產階級保皇份子手中奪回來〉，26日的〈再談黨委宣傳部長徐震是甚麼人〉等大字報，指責徐震文革前與「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過從甚密，散布過不少「反動言論」；文革中到處「滅火」，利用《紅纓槍》轉移鬥爭目標²⁵。

徐震深得復旦黨委信任，《紅纓槍》的所有工作都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對徐震的揭發批判必然牽連到復旦黨委。因此，6月26日復旦黨委專門開會討論。他們認為「少數派」學生對徐震和校黨委的攻訐，嚴重背離24日



1966年6月25日，由中文系四年級學生安文江等領袖貼出的大字報，運動矛頭逐漸轉向以徐震為代表的現任校黨委領導。（圖片由樊建政提供）

徐震深得復旦黨委信任，《紅纓槍》的所有工作都是在他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對徐震的揭發批判必然牽連到復旦黨委。因此，6月26日復旦黨委專門開會討論。他們認為「少數派」學生對徐震和校黨委的攻訐，嚴重背離24日

《人民日報》社論〈黨的陽光照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因為該社論提到「我們黨的各級組織，我們的黨員，我們黨的幹部，大多數是好的」²⁶。於是，校黨委指示《紅纓槍》寫作組的學生起草一張題為〈《紅纓槍》好得很！《追窮寇》好得很！〉的大字報，由蔡祖泉領銜簽署，於27日高調貼出。這張大字報批駁了「少數派」的觀點，強調「沒有黨的領導就沒有文化大革命」；言外之意，沒有復旦黨委的領導，就沒有復旦的文革運動²⁷。與此同時，校黨委主要領導、各系總支書記和各系指導員在各種場合反覆重申：揭批徐震的大字報斷章取義，「徐震問題，最多是工作缺點」，「不是牛鬼蛇神」²⁸；《紅纓槍》「是有一些缺點的，但沒有方向立場的錯誤」²⁹。

復旦黨委的上述言行，引發了一輪更為強勁的反彈。6月27日當晚，政治系部分學生即貼出大字報〈復旦黨委是資產階級保皇黨〉，指責校黨委「表面是人，暗中是鬼，當面說人話，背後說鬼話；他們是披着羊皮的狼，吃人的笑面虎！」³⁰該大字報也引用〈黨的陽光照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強調「對待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社會上一切人們是否擁護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試金石」。大字報直接將矛頭指向校黨委，其震撼力可想而知。直到晚上12點，這張大字報前還是人頭濟濟，圍觀不絕³¹。據筆者所見，這是復旦師生中最早把校黨委定性為修正主義者、並直接訴之於上海市委的典型。相比之下，此前的同類大字報根本不值一提³²。

進入7月，隨着《紅旗》雜誌鼓吹「信任群眾，依靠群眾」³³，圍繞徐震和《紅纓槍》的爭論持續激烈。6日，一張題為〈評《紅纓槍》的十論「追窮寇」〉的大字報，用了二十一頁紙對「十論追窮寇」逐篇駁斥，宣稱《紅纓槍》「握在黨委宣傳部長徐震手裏」，「竭力逃避主要矛盾」，「束縛革命師生的手腳，是那些保皇派保守派的擋箭牌」，「必須受到嚴正的徹底的批判」³⁴。這張大字報成為很多復旦師生思想轉變的重要觸媒³⁵。7日，中文系三名指導員也貼出揭批徐震的大字報³⁶。

面對最新運動態勢，復旦黨委不得不「丟車保帥」³⁷。7月9日，校黨委召開擴大會議，宣稱「徐震問題黨委早有覺察」，「王零在揭徐震問題上是最堅決的」³⁸。10日，各系總支書記和指導員群起而攻之，一天裏貼出揭批徐震的大字報多達104張。隨後兩三天，揭批徐震的大字報成倍增長，以至於校方不得不趕緊騰出十來個房間作為新的展示空間。徐震本人也積極配合，主動交出自己「有問題」的文章108篇³⁹。

在「少數派」學生看來，參與揭批徐震的政工幹部絕大多數與徐震相熟，他們幾天前還積極為徐震辯護，此時貼大字報揭批徐震，全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可謂假揭露、真包庇的活標本⁴⁰。這反而更激起「少數派」學生的鬥志。7月12日，他們貼出〈討論《紅纓槍》，必須挖根〉，14日又貼出〈中文系有保皇黨〉等大字報，把那些政工幹部之前為徐震辯護的言論都抖落出來，還揚言要「挖根」⁴¹。更具爆炸性的是，16日，新聞系二年級十一位學生貼出長達七千字的大字報〈四十個為甚麼——關於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問〉。這張大字報的作者都是《紅纓槍》寫作組成員，曾堅定地支持復旦黨委，在批判「反

動學術權威」時衝鋒在前^④。他們依據自己的親歷、親聞、親見，將復旦當前運動中眾所矚目的問題，尤其是校黨委的幕後活動，條分縷析，明確提出「『相信黨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因此，不能懷疑黨的基層組織。如果產生懷疑，那就是『抽象地相信黨』。這種論調又來自何方？」^④這在復旦師生中「引起強烈的共鳴，群情沸騰」^④。

如果說「六二〇事件」前後復旦「少數派」勢力還比較薄弱，那麼到7月上中旬，他們的聲勢已日益壯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新情況是，不斷有「多數派」學生臨陣倒戈，爆出「猛料」，對黨的一元化領導構成嚴重威脅。對此，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不能不採取反制措施。7月12和16日，上海市委教衛部部長常溪萍兩次親蒞復旦召開學生座談會，明確表態支持復旦黨委及《紅纓槍》^④。隨後，校黨委迅速擬定了一份所謂「活躍份子」（其實是「右派」、「反革命」、「反黨份子」的代名詞）名單，伺機秋後算賬^④。

然而上述反制措施緩不濟急，收效甚微。7月18日，中文系部分研究生貼出大字報，認為「徐震要揭，圍繞徐震周圍的人也要揭」^④。19日，哲學系「孫悟空」戰鬥組貼出由北京傳抄來的〈與新市委大學部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鼓譟「對一切黨委都要轟」^④。這張大字報「影響很大，許多年級、班有同學抄下大字報，進行小組議論」^④。在接下來的十多天時間裏，此類大字報愈來愈多，其中影響較大的包括〈就外文系長期存在的嚴重問題一問校黨委〉、〈和王零同志討論《紅纓槍》——十三問王零〉、〈我校文化大革命正處十字路口〉，等等。到8月初，復旦黨委和各系黨總支已普遍遭到「炮轟」，如〈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二問校黨委〉、〈踢開絆腳石——中文系黨總支〉、〈歷史系總支必須靠邊站〉、〈火燒物理系〉、〈火燒生物系〉，等等^⑤。

事後回看，復旦黨委當時最擔憂的，不是校內「少數派」的「炮轟」，而是「兩報一刊」中類似於「倒匡」的社論^⑤，特別是毛澤東對工作組問題的嚴厲批評。7月中下旬，毛多次對派工作組進駐大學和中學表達不滿，主張學校運動「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⑥。29日，「北京市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份子大會」（以下簡稱北京「七二九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周恩來代表中央宣布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指出工作組的錯誤在於「習慣過去的老一套」、「從上而下灌輸式的命令式的作〔做〕工作」，並強調要完成毛提出的「鬥、批、改」任務，「只能依靠各校的革命師生員工，首先是革命學生」^⑤。當日出版的《人民日報》，還配發了社論〈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⑥。

復旦沒有工作組進駐，但工作組犯下的種種所謂「錯誤」，從前述可見，復旦一應俱全。因而，其他地方的激進學生鼓譟「踢開工作組鬧革命」，同樣讓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感到壓力。7月23日，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宣傳文教工作的楊西光到復旦召開全校政工幹部會議，批評常溪萍16日召開的座談會，說常溪萍「對復旦運動作了不適當表揚」^⑤。楊西光此次講話的目的當然是「滅火」。他要求復旦黨委充分放手發動群眾，主動宣布不整學生，主動承認過去的錯誤^⑥。面對最新運動態勢，25日，復旦黨委召開全校師生員工

代表大會，公開承認「黨委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義很不理解，落後於形勢，落後於群眾」，「依靠群眾、相信群眾的工作，做的不夠」，「對群眾用大字報向黨委提意見引導不夠」^{⑤7}。這是文革發動以來校黨委的第一次公開檢查。29日，校黨委召開各系總支書記會議，指示與會者要「依靠革命師生搞文化革命」，尤其要樹立「以學生為主、向學生學習、依靠學生」的意識，要以「兩報一刊」社論作為一切工作的準繩。此後，校黨委又多次在各種場合做出類似表態^{⑤8}。這使得校內「少數派」學生「一片歡騰」、「無比激動」^{⑤9}。8月初，面對「少數派」學生提出的「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所有，校黨委作參謀」要求，一眾校黨委雖然內心極為不滿，但表面上不得不表示贊同，凌人盛氣已消失殆盡^{⑥0}。

上海市委的態度如出一轍。8月2日，上海市委召開全市幹部會議，會上播放了北京「七二九會議」錄音，供與會者學習借鑒^{⑥1}。3日，陳丕顯與楊西光指示上海各大學黨委書記，對於群眾自發起來「鬥鬼」，黨組織既不要阻攔，也不要鼓動^{⑥2}。5日晚，上海市委在文化廣場召開「上海市大專院校和中等學校師生員工文化大革命積極份子大會」，傳達毛澤東的「鬥、批、改」指示，正式宣布撤銷本市所派工作組，並再次播放了北京「七二九會議」錄音^{⑥3}。

上海市委和復旦黨委的所作所為，主觀意圖當然是為了迎合毛澤東，實際效果卻無異於放任自流，群眾想怎麼辦就怎麼辦、要怎麼幹就怎麼幹。「鬥鬼風」正是在這樣特殊的歷史語境下，突然席捲了復旦校園。

六 復旦「鬥鬼風」

就筆者所知，文革初期的惡性暴力事件，發生時間最早的要數南京師範學院的「八三事件」，社會影響最大的要數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八五事件」。前者造成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天石夫婦雙亡，後者導致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慘死^{⑥4}。目前沒有資料顯示上海各高校（包括復旦）的「鬥鬼風」與上述兩個事件存在直接關聯，但各地的此類事件無疑都是在相同的宏觀政治語境中發生的。

據一份文革時期編撰的資料記載，8月4日華東師範大學「鬥鬼」後^{⑥5}，楊西光曾打電話給復旦黨委，問「『師大門了，你們為甚麼不鬥？』過了不久，又打電話催問：『鬥了沒有？』聽說沒鬥，勃然大怒：『為甚麼不鬥？！』於是，復旦黨委慌忙布置」^{⑥6}。是年底，某復旦黨委副書記揭發楊西光說，復旦「鬥鬼風」的發生，與楊西光的三次電話指示有關^{⑥7}。類似的資料不在少數，其種類、語境、主體迥乎差異，但大都認定這股「鬥鬼風」源於上海市委領導楊西光和校黨委的暗中授意，是自上而下有組織地進行的^{⑥8}。

楊西光在其檢查交代材料中寫到，「八月初在師大發現武鬥的情況，我要復旦爭取主動，迅速加以掌握引導，這又是一種控制群眾運動的錯誤，結果發展成為了鬥鬼風」^{⑥9}。這份檢查交代寫於1966年12月8日，此時復旦黨委垮

台、楊西光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帽子。考慮到這種特殊的、極其不利的語境，對這份交代材料絕不應輕信，由此我們更願意相信：楊西光就此事給復旦黨委做過指示，其主觀動機是通過主動介入加以掌握引導，以避免事態失控。簡言之，他極可能還是主張要批判，但反對肢體暴力。至於從校黨委到各系總支，從各系總支到指導員，從指導員到各年級學生，各個層級如何理解楊西光的指示（不得不考慮中共各級幹部的一貫行事風格和復旦校內的最新運動態勢），是否有人在貫徹楊西光指示時夾雜一些私人恩怨等，則是另一回事。

據時任歷史系黨總支書記的余子道回憶^②：

在總支書記會議上絕對沒有布置名單。當然會後有沒有布置名單，也有可能。反正歷史系，絕對沒有人來給我布置過具體鬥誰。譚其驤是中國歷史地理學科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復旦歷史系教授。中共高層高度重視譚的研究，林彪曾專程到上海了解過譚的情況，「文革」爆發後又專門指示復旦黨委要保護譚不受衝擊。這些情況屬於黨內機密，譚本人並不知曉。譚被鬥是因為自己去看大字報，碰巧被撞見了，並非事先計劃。外文系，我也可以證明，黨委沒有具體布置過鬥誰。

文革運動風雲人物朱永嘉在回憶中提到^③：

「鬥鬼風」中被鬥的人有各種各樣的情況：有的是只知其在國民政府任職的情況，而不知其為共產黨做過的好事；有的是上級領導暗示的；有的則是已被點名的「資產階級學術權威」；也有像譚其驤那樣是群眾自發起來鬥的。……又如周予同、周谷城，六月份被重點批判，但他們的影響力太大，受中共高層高度重視，周予同甚至更早被毛接見，「鬥鬼風」中反倒早早被有意識地保護起來，由此也倖免罹難。

所以，復旦「鬥鬼風」實況的複雜性超乎想像，但群眾運動的暫時失控顯而易見。

復旦校園內的「鬥鬼風」始於8月5日傍晚，即華東師大「鬥鬼風」的翌日。此後的三天裏，著名專家學者（所謂「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和個別領導幹部（所謂「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共約五十人遭到肢體暴力摧殘^④。據歷史地理學專家譚其驤在日記中記載，8月6日，「宿舍小孩亦叫打倒，夜半呼聲不絕，通宵至清晨五時半」；7日，「聞校中鬥爭多人，呼口號聲終日不斷」，晚「十一時半上牀，口號聲猶不絕」；8日，「上午看大字報，至學生宿舍，被學生截留，被鬥，戴高帽，污以墨汁，被按下跪，汗衫被撕，被迫脫鞋遊校園。十時許出學生宿舍校門放歸。宿舍門口小孩亦喊打倒，家門口被樓上□□□貼『反革命老窩』等二張。皮膚被抓破多處，頸部、腰部扭傷，不重」^⑤。

復旦中文系研究生雷群明的日記更為詳細：8月5至8日，赤日炎炎，汗水濕透了全身，但是「鬥鬼」從早到晚一刻沒有停息，到處是鬥鬼台。一眾「牛

鬼」被勒令遊校，他們頭戴高帽，掛着大胸牌「牛鬼蛇神 × × ×」，手提破籮，邊敲邊喊「我是牛鬼蛇神」。高帽子別出心裁、各式各樣，取材於紙簍、水果簍子，糊以紙條，二三尺高，頂兒尖尖的。「牛鬼」全被黑墨澆臉，「只剩下兩隻眼睛，翻着白，真是『目灼灼』像鬼一樣」。歷史系教授蘇乾英「幾乎是癱了，被兩個人拖着走，據說褲子也被扯破了」。在中文系，「資產階級『權威』，包括趙景深、蔣天樞，全部被集中在系裏一間小房裏，低頭垂手罰站聽訓話」，「據說有的『武鬥』得不成樣子：用皮鞋打耳光，把頭髮減掉一半，剝光衣服，叫被鬥者作狗爬，等等」^⑭。

時為中文系青年教師的吳中杰回憶^⑮：

……朱東潤倒沒有被拉到台上去，就在離批鬥台不遠處，在學生宿舍前面的大路上批鬥了起來。朱東潤一向認為，一個人不能有傲氣，但必須有傲骨，他是說到做到，在紅色恐怖面前，果然鐵骨錚錚，不肯屈服。他根本不承認自己是「反共老手」，昂首挺胸，死不肯低頭。有人把他的頭壓下去，他又昂起來，有人要他下跪，他就是不跪，表現出臨難不懼的文人氣節。……

徐震則奉行「識時務者為俊傑」的古訓，低頭認罪，逆來順受，只是絕口不提黨委的問題。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命運還掌握在他們手裏。但是，批鬥者既是存心要製造恐怖氣氛，要表現自己的革命積極性，即使徐震低頭認罪，還是吃了很多苦頭。戴高帽子、坐噴氣式飛機之外，他的白汗衫上還被塗滿紅黑兩種墨水，塗之不足，更有人手提墨水桶，兜頭澆了下來，弄得他滿臉滿身都是，慘不忍睹。使我大為驚訝的是，主持批鬥徐震，用紅黑墨水澆得他滿身滿臉的，竟是徐震當年做中文系總支書記時一手培養的班幹部，現在她們卻對過去的頂頭上司下此辣手。……

但中文系還不算是最殘酷的。數學系的蘇步青在被批鬥之後，還帶着紙做的牛頭帽子遊街，當然也是滿身紅黑墨水；生物系在批鬥談家楨之後，用繩子捆着他在地上拖了很長的一段路，拖得死去活來；而70多歲的化學系教授趙丹若，頭天晚上被罰在天平室讀了一個晚上的《毛選》，本來就疲憊不堪，第二天又被拉出去批鬥，鬥完之後，還要遊街，殘酷的學生用草繩捆住他從台上直接往下拉，不幸當場就跌死了。……

不但老的被鬥，青年教師也有被鬥的。化學系的女教師徐燕，批鬥時被剃成了陰陽頭；新聞系的林帆，被戴上高帽子押着遊街；生物系的蘇德明，批鬥後被拖着走，鞋子都拖掉了，只好赤着腳跟着跑了很多路……

在「鬥鬼風」的高潮中，大字報欄上還貼出一張漫畫：《牛鬼蛇神群醜圖》，把周予同、周谷城、蘇步青、談家楨等人都醜化了一通。

……有機化學教授趙漢威，是中國第一個德國化學博士，在專業上有很高的威望，到了這時，卻被自稱為「紅色警衛連」的學生，掛着「牛鬼蛇神」的大牌，罰跪在物理樓前，背上還壓了一塊大水泥板。

復旦黨委儘管害怕遭到「壓制群眾運動」的指控，但如果失控的暴力事件釀成嚴重後果，校黨委同樣難辭其咎。所以到8月8日中午，王零召集全校政治指導員、文化革命小組組長、黨團支部書記開會，「建議最好不要打人，不要體罰」^⑥。當晚8點半，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播發毛澤東親自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其中明確規定「要用文鬥，不用武鬥」^⑦。這為校黨委的干預提供了合法性依據。在此背景下，復旦「鬥鬼風」很快止息。

七 結語

從批判所謂「反動學術權威」周谷城、周予同等人，已調離復旦的前黨委副書記、副校長陳傳綱，到揭批復旦黨委宣傳部部長徐震，再到「鬥鬼風」颳起，復旦的文革運動在1966年6至8月兩個月中經歷了顯著的階段性變化。《人民日報》社論對南大「倒匡」事件的定性和毛澤東對工作組問題的批評「猶如十級地震」^⑧，為復旦文革運動注入了新的元素，使得身為黨員幹部的陳傳綱和徐震也成為批判對象，進而引發圍繞校黨委領導班子的爭議。在校黨委的權威受到質疑的情況下，發生了少數師生主導的暴力事件。復旦個案中，特別值得重視的現象是「鬥鬼風」（正值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十六條」發布之際）中，遭到暴力批鬥的依然主要是「反動學術權威」。除了陳傳綱和徐震等個別人士，校內各級黨組織負責人並未受到實質性衝擊，復旦黨委領導班子的權威還能在風雨飄搖中得以維繫，依舊可以輕而易舉地終止「鬥鬼風」。

文革初期批鬥「反動學術權威」的此類現象，被某些論著歸咎於復旦黨委試圖「轉移鬥爭目標」（以下簡稱「轉移目標」說），認定其目的在於規避〈五一六通知〉認定的重點鬥爭對象——「黨內走資派」。此類論著存在前設判斷，認為〈五一六通知〉所載明的重點鬥爭對象是一個，而非兩個，即「黨內走資派」^⑨。事實上，文革初期基層黨組織的主導角色、運動愈往後愈趨向於整「黨內走資派」的史實，似乎都坐實了這種解釋。在當年的復旦文革大字報選、眾多復旦文革運動親歷者的記憶中，類似解釋也頗為盛行。不能不說，文革中基層黨組織的主導性角色，決定了其「轉移目標」之嫌疑最大，但未經確鑿資料證明之前，他們只能被當作嫌疑犯，適用於他們的只能且必須是無罪推定原則。本文關於華東局、上海市委及復旦黨委之文革政策與部署的敘述表明，「轉移目標」說之解釋與復旦案例並不完全吻合。復旦文革大字報所謂「轉移目標」說，不過是「少數派」不了解華東局、上海市委在文革發動問題上的汗馬功勞，不了解後者因此得到高層高度肯定，也不可能掌握復旦黨委幹部人事檔案的情況下，僅憑「兩報一刊」社論、北大大字報事件、南大「倒匡」事件等經驗，再加上滿腔革命熱情，對復旦文革運動的摳字眼式、類推式猜疑^⑩。

為甚麼「鬥鬼」風潮中主要的衝擊對象始終是「反動學術權威」？為甚麼「轉移目標」說這樣的歷史錯覺會大行其道？倒是值得深究的議題。我們認為，其

更合理的解釋切入口是中共建政以來長期的意識形態灌輸與領導體制。前者的內核沿襲自1949年之前業已形成的「階級」對抗觀念，聚焦於所謂階級「殘餘」，強調「鑽進黨內的壞份子只是極少數」，「只存在於部分基層組織中，並不是全黨的情況」，更重要的是「黨內起決定作用和領導作用的，並不是那些不夠標準或不完全夠標準的黨員，更不是壞份子」，黨始終是「偉大的、光榮的和正確的」^①，一般民眾極少會意識到黨自身異化成「新階級」的可能性^②；後者的首要原則是「黨的一元化領導」，強調黨在國家社會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和主導作用，即以各地區最高領導機關的地位統一領導地方的各項工作。「階級」對抗觀念與「一元化領導」交織疊加，促使共產黨組織國家化與集權化，到1960年代，特別是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以後，國家權力結構在縱向和橫向兩個方向均向黨系統集中（以下簡稱「縱向集權」、「橫向集權」），其結果不僅是橫向權力集中到黨的系統，而且黨的系統的權力縱向上收，構成一種金字塔式的權力配置結構^③。

正如鄧小平在文革後所言，「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甚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權力過份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④。文革前夕，階級鬥爭的調門之高無以復加，「一元化領導」下的橫向權力結構之具象意涵可以說是各級黨組織在所轄區域內擁有絕對權力，甚至是黨委一把手決定一切，此即前文提及的「絕對正確」。檢視文革最初兩個月（甚至10月之前）的「兩報一刊」社論，如下四條一以貫之，且為必要構件：（1）黨內、黨外都要搞（即「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⑤）；（2）黨的領導不能放鬆；（3）絕大多數黨員幹部是好的；（4）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不能不說，所貫徹的就是「一元化領導」。

史實表明，復旦黨委正是據此認識，才敢於在自身合法性與權威不斷遭遇蠶食的情況下，不斷強調要加強對本校運動的掌控，並始終保有相當的自由裁量空間，堅持自己「絕對正確」，將自身排除於黨內「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或「走資派」）之列^⑥，始終以批鬥「反動學術權威」為主；與此同時，從6月到8月初，復旦「少數派」對「一元化領導」依然認同，他們不是要推翻校黨委（更不是要推翻上海市委），他們對文革運動的理解與一眾復旦黨委的理解差別並不大，即「大文革」是「小文革」的繼續與深化。正因為存在着這樣的廣泛共識，復旦黨委號召批判「反動學術權威」，表態支持少數師生批判陳傳綱和徐震，即便遭遇愈來愈多攻擊之時，依舊能得到大多數師生的信任與擁護；此其一。

其二，「轉移目標」說大行其道的根源也在於「一元化領導」。在上述社論之四條必要構件中，「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屬另類，值得格外重視。不言而喻，這與1966年6月毛澤東期冀「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高度契合^⑦。但是，南大「倒匡」事件、撤銷工作組事件、復旦案例，以及同時期相關社論表明，「要放手，不怕亂」與「橫向集權」難以兼容，甚或勢不

兩立。只要「橫向集權」繼續維持，地方黨委的自由裁量權就能得到尊重，文革運動就只會繼續「冷冷清清」；相反，唯有破除匡亞明一類的「阻力」，人為製造示範效應，「要放手，不怕亂」式的群眾運動才能被釋放出來^⑧。進而，所謂「革命師生」具體說了甚麼、有無根據，甚或「鬧翻天」已不重要，重要的唯有開口鳴放、揭發，此即前述「倒匡」社論的要害用意。以此觀之，稱「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為史無前例，可謂再名副其實不過。不難想像其結果必然是：一方面，群眾想怎麼說就怎麼說，謠言誣衊一切皆成可能；另一方面，毛的主張作為最高指示、唯一的對錯衡量尺度，「橫向集權」無可奈何，必須且只能無條件恪遵——套用文革話語說，「不理解也要執行」，即便蒙受無妄之災也無澄清、辯解之機會，否則就可能背負「壓制群眾」，乃至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名。一句話，「一元化領導」導致「權力蠶房化」，既困住了毛，也困住了各級黨組織，令整個中共黨組織體系陷入了進退維谷的泥淖，失去了自我維持與糾錯的能力，此即所謂「轉移目標」說大行其道的緣由。

行文至此，有必要再次強調復旦個案的獨特之處在於該校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汗馬功臣與忠實緊跟者，其突出意義在於凸顯了釀就文革初期高校「鬥鬼」風潮及其內蘊的黨群衝突的更關鍵、亦是更合理的考量因素，應是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日益極端化的集權體制，「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⑨。派性分析固然有其合理性，但派性只有在非常態政治之下才可能顯其神通，在休養生息、不折騰的常態政治下，則自然歸於消解。當然，不掌握來自高層的權威證據，僅依據復旦情況所作的這些討論也只能是拋磚引玉。（本期續完）

註釋

① 董國強：〈從南京大學「倒匡」事件看「文革」的複雜屬性與多重面相〉，《二十一世紀》網絡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6年9月號，www.cuhk.edu.hk/ics/21c/media/online/0604048.pdf。

② 〈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人民日報》，1966年6月16日，第1版。

③ 〈革命師生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大鬧無產階級文化革命 南京大學揪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份子匡亞明 江蘇省委決定撤銷匡亞明一切職務，受到熱烈擁護〉，《人民日報》，1966年6月16日，第1版。

④⑤ 〈向陳傳綱同志提出十二個為甚麼〉（1966年6月18日），載「史紅」戰鬥組編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輯，油印件（1967年5月），頁1；1-3。

⑥ 「心向党」戰鬥小組編，生物系「赤衛隊」翻印：《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手刻翻印油印件（1966年11月14日），頁5；〈向陳傳綱同志提出十二個為甚麼〉，頁1-2。該大字報註明，初稿草擬於6月14日，於18日貼出。14日當天，哲學系學生只是請校黨委審閱或轉交市委，沒有要求馬上公布。

⑦ 參見〈向陳傳綱同志提出十二個為甚麼〉按語，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輯，頁1；中共復旦大學黨委：《中共復旦大學黨史大事

記(一九六六年)(草稿)》，油印件(約1984年前後)，頁18。該大事記明確說，6月1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放手發動群眾，徹底打倒反革命黑幫〉、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倒匡」，在復旦「校內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特別需要說明的是，陳傳綱為何被批，至今在復旦備受關注、眾說紛紜。第一種看法為「派系排斥」說，從文革中到文革後乃至今日依然流行，認為批陳傳綱既與「五人反黨集團」冤案有關、又與陳傳綱的知識份子氣質有關，更重要的因素是以楊西光、王零為首的校黨委派系排斥、排擠陳傳綱。另一種看法為「迫不得已」說，其大意是陳傳綱「問題比較暴露」，「群眾揭發後，才逼住非鬥爭不可」，此前校黨委對陳傳綱多有保護，生活上也很照顧，甚至2003年王零對朱永嘉回憶說，「當時楊西光打電話讓他不要叫陳傳綱來看大字報，楊考慮到他畢竟是高教局的人，但陳傳綱已經來了」。詳見紅衛兵復旦大學革命委員會宣傳組印，上海海運學院紅革會紅色造反兵團「鬥批改戰鬥組」翻印：〈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楊西光的檢查交代〉(1966年12月8日)，油印翻印件(1966年12月23日)，頁1；〈「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發言——黨委副書記鄭子文晚上發言〉，油印件(約1966年12月11日)，無頁碼；朱永嘉口述，金光耀、鄧杰整理：《巴申春秋：我對文革初期兩段史實的回憶》(香港：大風出版社，2014)，頁66-67。筆者以為，以上說法視角不同，折射了批判陳傳綱事件的複雜性與多歧性，均有其合理性，但導致陳傳綱被批的更關鍵、更重要的決定性因素無疑是宏觀政治背景，即「傾巢之下，焉有完卵」，而校黨委內部的派性分歧是次要因素，僅在誰最容易被批、被批至何種程度的問題上起作用。鑒於評析以上說法實屬必要，以及其與本文所持觀點之密切關聯性，筆者於此簡要交代。

⑦ 〈《向陳傳綱同志提出十二個為甚麼》按語〉，頁1。

⑧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打字油印件(1966年9月8日)，頁15；《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5。

⑩ 〈復旦黨委是資產階級保皇黨嗎？——三評譚啟泰、歐陽靖《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1966年8月23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油印件(1967年4月)，頁69。

⑪⑫ 中共復旦大學黨委：《中共復旦大學黨史大事記(一九六六年)(草稿)》，頁27；20。

⑬ 〈「十論追窮寇」用意何在〉(1966年6月20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該大字報貼出的時間應該在6月19日晚，詳見雷群明：《逝者如斯：讀研日記(下)(1964-1968)》，自印本(2013)，頁469。「十論追窮寇」是簡稱，實指學生牆報《紅纓槍》第4期以「十論追窮寇」為主題的十篇政論短文。

⑭ 〈革命的大字報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鏡〉，《人民日報》，1966年6月20日，第1版。

⑮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8-23；《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7；雷群明6月20日日記載：「昨晚數五(四)一批人別有用心地向《紅纓槍》提出了挑戰，質問《十論追窮寇》用意何在？分明是把矛頭指向黨委。今天一早，又在飯廳門口發現有叫陳建煒(化三)者，貼出了一張大字報，號召同學們『把矛頭轉過來對隱藏在黨委內部的牛鬼蛇神』，接着群起而響應他們的大字報紛紛出籠，出語越來越惡毒，矛頭越來越針對黨委，認為黨委就是和北大、南大一樣，咒罵黨委裏面有鬼，是『黑手』，形成一股小逆流。」參見雷群明：《逝者如斯》，頁469-70。

⑯ 〈把矛頭轉過來〉(1966年6月20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

⑰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紅旗》，1966年第8期，頁4；《人民日報》，1966年6月11日，第1版。

⑱ 〈校黨委要把我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何處？〉(1966年6月20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5-16。

- ⑮⑯⑰⑱⑲⑳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9；29；44；46-47；50-51；62。
- ㉑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9、18。另參見〈關於所謂「打楊戰役」的情況簡介〉（無日期），手抄件，頁4。該件由復旦歷史系前黨總支書記余子道提供，是復旦官方1980年代中期所作的關於文革期間復旦重大事件的清查、處理結論。
- ㉒⑳㉓ 金光耀：〈文革爆發之初的基層黨委：以復旦大學為例〉，未刊稿，頁5；8；8、9。
- ㉔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24；《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6-8。
- ㉕ 〈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1966年8月11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54。
- ㉖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28；〈黨委宣傳部長徐震是甚麼人？〉（1966年6月25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2。
- ㉗ 〈黨委宣傳部長徐震是甚麼人？〉，頁21-22；吳中杰：《復旦往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153；安文江：〈我不懺悔〉，載周明主編：《歷史在這裏沉思——1966-1976年紀實》，第五卷（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1989），頁303。
- ㉘ 〈黨的陽光照亮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道路〉，《人民日報》，1966年6月24日，第1版。
- ㉙ 〈《紅纓槍》好得很！《追窮寇》好得很！〉（1966年6月27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9-30。
- ㉚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32-33、35、37-38、41、42、44；〈四十個為甚麼——關於我校文化大革命的一些疑問〉（1966年7月16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36；雷群明：《逝者如斯》，頁515。
- ㉛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36、41-43、46；雷群明：《逝者如斯》，頁515。
- ㉜ 〈復旦黨委是資產階級保皇黨〉（1966年6月27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7-20。
- ㉝⑳㉞⑳㉟ 雷群明：《逝者如斯》，頁478-79；486；491；487-88。
- ㊱ 董國強、樊建政：〈文革時期「極左思潮」個案：上海「反復辟學會」（上）〉，《二十一世紀》，2019年6月號，頁68。
- ㊲ 〈信任群眾，依靠群眾〉，《紅旗》，1966年第9期，頁28-30。該社論說，「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用群眾運動的方法，進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偉大的創舉」，「億萬人民起來批判舊世界，是這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根本特點」，「只有動員群眾，大搞群眾運動，出大字報，大鳴、大放、大辯論」，「才能把一切牛鬼蛇神暴露出來，把他們打倒」，「才能真正解決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誰戰勝誰的問題」。
- ㊳ 〈評《紅纓槍》的十論「追窮寇」〉（1966年7月6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22-29。
- ㊴ 〈評《紅纓槍》——再論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1966年8月20日）、〈復旦黨委是資產階級保皇黨嗎？〉，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95、70；〈揭徐震前後〉（1966年7月底），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輯，頁34-37；吳中杰：《復旦往事》，頁151-53。
- ㊵ 《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13；〈對復旦文化大革命若干問題的意見〉（1966年9月19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59。
- ㊶ 〈粉碎周予同「披逆鱗」的狼子野心〉，《解放日報》，1966年7月6日，第3版。

- ④③ 〈四十個為甚麼〉，頁34。
- ④④ 〈四十個為甚麼〉，頁31-37；〈以王零為首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批判——《四十個為甚麼》前後〉（1966年10月9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96-202；林良旗訪談，上海，2019年7月25日。林良旗是新聞系二年級十一位留校學生之一，〈四十個為甚麼〉的署名作者、大字報抄寫者。
- ④⑤ 〈常溪萍在復旦談話紀要〉（1966年7月16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52-53。
- ④⑥ 樊建政、董國強：〈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黑材料」風潮〉，《二十一世紀》，2016年6月號，頁36。
- ④⑦ 參見「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51；《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15。〈與新市委大學部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又稱〈二十二個問題〉，許克敏時為改組後的北京市委大學部領導，6月18日接待了北京林學院五位學生的來訪，19日許克敏的談話被整理、貼出，並很快轉抄到全國許多地方。這份談話紀要的思想基調是懷疑一切、鼓勵揭批。參見〈與新市委大學部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1966年6月19日），載首都南下革命造反縱隊總部宣傳部翻印：《為全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徹底翻案（〈與新市委大學部許克敏同志談話紀要〉專輯）》，打印件（上海，1966年12月），頁19-23。
- ④⑧ 《人民日報》「倒匡」社論除給復旦造成前述的惡劣影響外，給復旦黨委領導造成的直接壓力也不小。該文發表前夕，6月15日，復旦黨委代理書記王零要求劃掉《紅纓槍》第4期〈黨指揮槍桿子〉一文中的「校黨委正確」字樣，並明確表示「黨委不是絕對正確的」；16日即「倒匡」社論發表的當日，復旦黨委停止了徐震聯繫中文系、新聞系的工作，其後在17、18日，黨委召開擴大會議批判陳傳綱的同時，也內部揭發、批判徐震。此可謂復旦黨委對「兩報一刊」社論高度敏感的典型。詳見《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5-6；「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13-14。
- ④⑨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601、602。
- ④⑩ 〈七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市大專學校和中等學校師生文化大革命積極份子大會周恩來同志的講話〉（1966年7月29日），載首都大專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隊編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央首長講話選編》，第一集，鉛印件（1966年12月），頁23-24；《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603。
- ④⑪ 〈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人民日報》，1966年7月29日，第1版。
- ④⑫ 中共復旦大學黨委：《中共復旦大學黨史大事記（一九六六年）（草稿）》，頁20；《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15。
- ④⑬ 《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16-17；「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54。
- ④⑭ 〈毛澤東主義（「八·一八」）紅衛兵聯絡部聲明〉（1966年9月26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165；雷群明：《逝者如斯》，頁513。
- ④⑮ 〈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1966年8月1日）、〈《一切權力歸文化革命委員會（1966年7月31日）》按語〉，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輯，頁51；「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59。
- ④⑯⑰ 市委辦公廳革命造反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地區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供大批判參考）》，鉛印件（1967年11月），頁16。
- ④⑱ 朱永嘉：《巴申春秋》，頁76。
- ④⑲ 「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60；雷群明：《逝者如斯》，頁511。

- ⑥④ 參見葉維麗：〈卞仲耘之死〉（未刊中譯修改稿），葉維麗提供，英文稿參見 Weili Ye, "The Death of Bian Zhongyun",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3, no. 2 (2006): 203-40。
- ⑥⑤ 文革初期，許春芳任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教材教法教研室副主任、校半工半讀試點班教師組組長，分管所在教研室教師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她說清楚地記得8月4日上午校黨委曾給她們打招呼，說「激動派」（類似於復旦的「少數派」）可能會亂揪亂鬥，這種情況如果發生，應進行勸導，要「激動派」不要打人。她分析說，8月4日華東師大的「鬥鬼風」，既不能簡單歸責於校黨委，也不能說跟校黨委毫無干系，因為被鬥的全是老教授和所謂思想「右傾」的黨政幹部，他們的所謂罪證材料在之前早就公布，不僅人所共知而且被批判，沒有之前的批判作基礎，很難說會有後來的「鬥鬼風」；與此同時，「激動派」也有「鬥鬼」的熱情。至於校黨委是否明確下達過「鬥鬼」指示，以及提供過「牛鬼」名單，她說不掌握相關情況。參見許春芳電話訪談，上海，2019年8月18日。關於8月4日華東師大「鬥鬼風」情況，參見樊建政、董國強：〈文革初期復旦大學的「鬥鬼」風潮（上）〉，《二十一世紀》，2022年6月號，頁89。
- ⑥⑦ 〈「向上海市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大會發言〉，無頁碼。
- ⑥⑧ 〈堅決罷掉復旦黨委的官〉、〈十萬個為甚麼〉（1966年9月4日），載《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字報選》，第一、二合輯，頁58、150；中共復旦大學黨委：《中共復旦大學黨史大事記（一九六六年）（草稿）》，頁22；吳中杰：《復旦往事》，頁155-58。
- ⑥⑨ 〈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楊西光的檢查交代〉，頁2。
- ⑦⑩ 余子道訪談，上海，2013年7月16日。
- ⑦⑪ 朱永嘉：《已申春秋》，頁74；朱永嘉電話訪談，上海，2019年8月19日。
- ⑦⑫ 陳丕顯：《陳丕顯回憶錄——在「一月風暴」的中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63；〈十萬個為甚麼〉，頁150；雷群明：《逝者如斯》，頁511-14；譚其驤：《譚其驤日記》（上海：文匯出版社，1998），頁114-15。
- ⑦⑬ 譚其驤：《譚其驤日記》，頁114-15。
- ⑦⑭ 雷群明在6、7月間支持黨委，8月初反戈造反，後為復旦中文系研究生造反兵團負責人。參見雷群明：《逝者如斯》，頁511-14。引用雷群明日記時，與譚其驤日記重複處從略。
- ⑦⑮ 吳中杰：《復旦往事》，頁155-58。
- ⑦⑯ 《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事記》，頁19；「過河卒」戰鬥小組：《復旦大學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紀事》，頁62。兩種大事記的記述略微不同，「過河卒」版本說是「鬥爭牛鬼蛇神最好用文鬥」，但意思大體相同。
- ⑦⑰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1966年8月8日通過），載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黨史黨建政工教研室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內部發行，1988），頁74。
- ⑦⑱ 葉維麗與于光遠的談話，杭州，2002年7月5至7日。
- ⑦⑲ 麥克法夸爾（Roderick MacFarquhar）、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著，關心譯：《毛澤東最後的革命》（台北：左岸文化，2009），頁59、80、84。
- ⑧⑰ 此種摳字眼式、類推式猜疑的典型，即是〈校黨委要把我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何處？〉，頁15-16。該大字報說，「運動剛剛開始，矛盾還沒有完全揭開，為甚麼會有人明目張膽地給校黨委打包票呢？現在事實給了那些打『包票』的人一記有力的耳光，黨委原來的的主要負責人陳傳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組織部長李慶雲也是一個公然包庇反革命份子的反黨份子，其他部門也不是沒有的……。有誰能擔保校黨委沒有問題呢？我們能完全相信這樣的校黨委嗎？放空氣的人站出來，明確回答下面問題：到底誰指示你們放空氣的，這樣做居心何在？從以上揭露材料來看，我們認為校黨委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作所為，是違背黨中央和毛主席的知識的，是企圖轉移鬥爭目標的」。「打包票」，又作「打保票」，寓意有絕對的把握，常借謂完全擔保。此外，常溪萍明確告訴復旦「少數派」，必須有確鑿

的材料，才能說明問題，「如果沒有材料，只是懷疑，那你自己去考慮，結論你不能下得太早，結論下早了，就不利於革命」，復旦黨委「多數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對黨中央、毛主席發出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是積極的，跟市委是跟得緊的，引火燒身是搞得好的」，說復旦黨委在批判二周（周谷城、周予同）問題上搞「假批判，真掩護」的論調沒有依據。參見〈常溪萍在復旦談話紀要〉，頁50-51。

③① 劉少奇：〈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奮鬥〉（1951年4月9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3年彙編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108。

③② 「新階級」指蘇聯式共產黨以取消階級為號召開始，但建政以後與之前的革命相反，竟造成了一個握有空前絕對權威的新階級，「新階級」是一群政治官僚實行「傳統式的寡頭統治」。詳見德熱拉斯（Milovan Djilas）著，陳逸譯：《新階級：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分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頁14-32。

③③ 參見鄭謙等：《當代中國政治體制發展概要》（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頁10、80-147；劉少奇：〈堅持優良作風，健全黨內生活〉（1962年1月27日），載《文獻和研究（1983年彙編本）》，頁136-39，該報告在強調「黨委領導一切是必須堅持的原則」的前提下，批評以黨代政，「把政治掛帥誤解為第一書記決定一切，或者某一書記在某一方面決定一切，甚麼事情都是個人說了算，甚麼事情都要找他」，並批評黨內生活存在諸如以下的不正常現象：「不容許黨員提出不同的意見，把敢於提意見的人，隨便說成是有思想問題，甚至指為『反黨份子』」；「不容許黨員在黨的會議上，自由地切實地討論工作問題和政策問題，不容許黨員批評工作中的缺點，特別是批評黨組織領導人員的缺點」；「甚至把黨員對具體工作的具體意見，錯誤地說成是政治問題和路線問題，把黨員對黨組織領導大員的批評，錯誤地說成是反對黨的領導」；「採取過火鬥爭和懲辦主義的辦法，鬥爭和過重地處分了有一些缺點和錯誤的黨員，甚至鬥爭和處分了堅持真理、敢於說真話的黨員」；「對於向上級反映真實情況的黨員，進行打擊報復」；「不按照黨章的規定，隨意吸收不夠條件的人入黨，隨意把黨員開除出黨」；「混淆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竟然用對待敵人的手段，審判和懲罰了一些有缺點和錯誤的黨員，甚至審判和懲罰了敢於說真話、敢於堅持真理的黨員」。假如可以單純考慮劉少奇所說的這些現象，文革初期的黨內生活狀況至少依舊如此。

③④⑤ 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1980年8月18日），載《鄧小平文選》，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29；333。

③⑤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5月18日上午），載山西東風革命造反兵團總部宣傳部編印：《林彪同志重要講話彙集》，鉛印本（1967年10月），頁40-41。該講話指出，「毛主席近幾年來，特別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義的問題，黨內黨外，各個戰線、各個地區、上層下層都可能出。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領導機關」。

③⑥ 李慶雲：《我在復旦的三十年》，自印本（2010），頁24-25，李慶雲提供。

③⑦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頁593、596。1966年6月10日晚，毛澤東在杭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話，指示「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暴露出來」。

③⑧ 江渭清回憶南京大學「倒匡」運動說，「在江蘇南京地區最先亂起來的南京大學，提出要將匡亞明同志『戴高帽子遊街』，還要轟走剛進校的工作隊，搬掉『絆腳石』，實際上是要擺脫黨對運動的領導」。詳見江渭清：《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憶錄》（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518。

樊建政 華東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

董國強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